

■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先秦两汉

巴蜀书社

译注 雪 克 王云璐

审阅 董治安 许嘉璐

荀子选译

荀子选译



(川) 新登字008号

责任编辑：黄小石

封面题签：启 功

封面设计：陈世五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荀子选译

雪克 王云路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 9.375 字数150千

1991年10月第一版

199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ISBN7-80523-358-6/Z·28

定 价：140.00 元(第二批50种)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本功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过程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与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文力

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的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学术大繁荣，当推春秋战国时代。那是一个百家争鸣、光辉灿烂的时代，诸多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涌现出来积极活动，著书立说，各出机杼，熔铸了一系列极为丰富而深刻的思想理论，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极其重要的思维成果。

战国时期位于齐国都城的稷下学宫，就是我国古代人材荟萃、百家争鸣的一处著名所在地；而荀子，正是长期活跃于稷下学宫的杰出思想家和文学学。

荀子，名况，字卿（荀字又作“孙”，故荀子又称孙卿；孙卿子）。参照各种有关材料，我们认为，荀子当生于公元前307年（即周赧王八年）前

后，卒于公元前213年（即秦始皇三十四年）左右，大约活了九十四岁。荀子的主要活动时期，大约在公元前282年到前238年之间。

荀子的一生同齐国关系密切，如上所说，齐之稷下学宫对他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给予了重大的影响。据记载，荀子十五岁时即游学于齐，在稷下学宫居留较长时间。当时齐国正是威王、宣王当政，志在图强，称雄东方，因而不惜重金招贤纳士；四方学者云集齐都，从而形成稷下学宫最为兴盛的时期。稷下学士们相互辩论、著书立说，极大地促进了思想的活跃，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开展。齐湣王执政时，稷下学宫开始衰败，学者们纷纷离去，“慎到、接子皆亡去，田骈如薛，孙卿适楚”（桓宽《盐铁论·论儒》）。齐襄王执政，稷下学宫重又开始复兴，荀子也回到齐国。此时在稷下学宫中，荀子最有威望，最受推重，曾三为“祭酒”（古时饮食祭祀时，推举席中年长位尊者一人为“祭酒”，后因此为官号）。

此外，荀子一生还先后到过秦、楚、赵等国。在秦他虽未被任用，却曾受到秦昭王的称赞；在赵，他被奉为上客，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前；在楚，他先后两次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免官，最后废居兰陵，著书立说，培养门徒，直至去世。

《荀子》一书，绝大部分出自荀子的手笔。但在此外的一部分中，有几篇似出自其门人的记录整理，如《儒效》、《议兵》、《强国》等篇中，都有称“孙卿子”的字样，就是证明；又有几篇似为其后学所记或杂录传记而成，象《大略》以后六篇就可能属于这一类。又，《荀子》书中有些与先秦其他典籍相似或相同的文字，如《礼记》之同于《礼记·三年问》和《大戴礼记·礼三本》；《乐论》之同于《礼记·乐论》及《乡饮酒义》；《劝学》之同于《大戴礼记·劝学》等等。其间情况比较复杂，难以一概而论。有些问题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荀子》一书流传到西汉，经刘向校录整理，定为十二卷三十二篇，取名《孙卿新书》。班固《汉书·艺文志》称之为《孙卿子》。到了唐代中叶，杨倞把荀子的三十二篇重新分为二十卷，对各篇的次序也有所调整，并首为之作注，称《荀卿子》，宋以后则通称为《荀子》。这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荀子》一书。

作为战国后期著名的学者和政论家，荀子批判地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许多流派的进步观点，建立了一个规模宏大的思想体系，成为先秦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一书广博宏深，内涵丰

富，涉及到哲学、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教育等一系列领域，在学术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韩非子·显学篇》讲孔子之后“儒分为八”，而八儒之中的“孙氏之儒”即指荀子。作为战国末期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荀子尊崇孔子和子弓，以儒家的《礼》、《乐》、《诗》、《书》、《春秋》教育学生，但他的思想有些已超越了孔子。荀子反对子思和孟轲，视他们为儒家的罪人，思想上常处于与之对立的地位。荀子的政治观中，有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一、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提出“法后王，一制度”的封建统一论，主张建立统一、集中的封建政权，反映了他的进步的历史观以及对社会历史变革与继承的看法。在《儒效》、《致士》、《王制》等篇中，荀子多次强调齐一制度、统一天下，结束诸侯异政、分裂割据的局面。为了这一政治理想，荀子主张把诸侯争霸引向用武力统一全国，他认为专为兼并别国土地而战的军队都是“末世之兵”、是“盗兵”，只有为统一而战的“王者之师”、“仁人之兵”才是无敌于天下的。荀子是杰出的军事家，他的《议兵》篇对军事理论作了系统探讨，并详细论证了关于统一战争中的战略与战

术。为了统一天下的政治理想，荀子提出了“富国裕民”的主张，认为只有通过“裕民”政策使百姓先富起来，才能国富兵强，使国家有强大的优势，有足够的物质储备，进而实现“一天下，财万物”的理想。荀子的经济思想、军事思想，都是他政治思想的补充和延伸。

二、为实现封建统一而提出的礼法并重论。

“礼治”和“法治”本来是儒、法两家对立的政治主张，荀子继承了孔子的“礼治”、“仁政”思想，又吸收了前期法家的“法治”、“势治”和“尽地力”等观点，主张既“隆礼”，又重法。荀子非常重视礼的作用，把礼和人的物质需要、生活欲望联系在一起，认为礼以顺人心为本，说“亡于《礼经》而顺人心者，皆礼也”（《大略》）。主张用“礼义”区分人们的名分等级，使人们的关系协调一致。他认为礼是立法的依据，“礼义生而制法度”（《性恶》），又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劝学》），“法者，治之端也”（《君道》）。把礼和法同样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措施，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准绳，他说“隆礼至法而国有常”（《君道》）。在当时战乱迭起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礼法兼重的主张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三、在人材选拔和使用上的任人唯贤论。荀子

认为，任人唯亲会导致国家灭亡，只有“不恤亲疏”、“不恤贵贱”，“唯诚能之求”，才能加强中央集权，实现“一天下”的政治理想。他强调要“贤能不待次而举”、破格提拔人才，他认为即使王公大夫的子孙，如果违反封建礼法，也要“归之庶人”；而庶人之子孙能守礼义、“积文学”的，就应提拔为“卿相士大夫”。这些都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意愿，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荀子在历史上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对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而自然观又正是他唯物主义思想中最为光辉的方面。《天论》篇集中反映了荀子对天道、天、人、社会关系的认识，充满了昂扬向上的活力和生气。

先秦诸子对天的看法各不相同。孔子对天命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但他的弟子子夏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话；他自己也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这就肯定了天命的存在。老子认为天产生于道，而所谓道，却是一个唯心主义的虚构；他抹煞天道与人事的区别，要人们消极无为，也有浓重的神秘主义倾向。墨子公然相信天命、主张“明鬼”，就更带有宗教唯心主义色彩。而荀子则能从生活、哲学上去比较正确地认识自然现象，对天和天人关系都积极地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从而把先秦唯物主义思想提高到一个新高度。荀子认为，天地万物是唯一实在的物质世界，各种事物都处于这个物质世界中。“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天论》）。而自然界的变化也是自然物内部对立的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礼论》）。荀子认为，自然万物的运行是有规律的，《天论》开篇就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它有自己的产生、运动、发展的规律，所有那些日月星辰、阴阳四时等现象的出现，都是随自然规律的运行而产生的正常现象。荀子还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的观点，把天与人相分离，指明两者并无任何联系。如果人们加强生产，节约开支，天也不能使人贫穷；如果荒废了农业生产，而又奢侈浪费，天也不能使人富裕。不仅人的祸福吉凶与天无关，而且社会的治乱、国家的兴废，也同样与天无关。荀子这种天人相分论，第一次从理论上把人与神、自然与社会区分开来，是对天命迷信的有力批判。荀子认为“天地之变”可怪而不可畏。他对“木鸣”、“星坠”等异常现象虽然不能作出具体的科学解释，但他指出这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天论》）荀子反对关于鬼神的迷信心理，承认

祭祀、卜筮等宗教仪式可以作为一种文饰工具而存在；荀子反对相人相术，“长短、大小、善恶、形相，非吉凶也”（《非相》），这些看法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荀子还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对此他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失之也！”（《天论》）表现了人定胜天的气魄。

荀子的这些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东汉王充关于“天地合气，万物自来”、“夫天道，自然也”的唯物思想（《论衡·自然篇》）；唐柳宗元“功者自动，祸者自祸”的见解（见《天说》），以及刘禹锡“天与人交相胜”的思想，都与荀子的自然观有密切联系。

荀子反对人们思想上的“蔽于一曲”（《解蔽》），坚持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我国古代学者对于认识来源的问题，多侧重于主体认识方面的研究，强调心性修养。而荀子则明确指出：“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解蔽》）既肯定了人具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又承认客观事物是可以认识的。他认为人体五官与外物接触，所获得的感受是不同的，也是不能互相代替的。“耳、

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天论》），因此每一感官对事物的感知都具有局限性，即有片面性和表面性，荀子称之为“蔽”。《解蔽》篇多方面探讨了如何达到认识上全面透彻、没有偏蔽的思想境界。其中，特别强调要发挥“心”的“征知”作用，“壹虚而静”，以便透过现象，力求全面、本质地认识事物。

在人性论方面，荀子针对孟子的“性善”论，提出“性恶”的反命题。荀子从人们“生而有耳目之欲”的生理要求出发，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善良是后天人为的表现。“好利”、“疾（嫉）恶”、“好声色”都属于“人之性恶”。荀子把后天养成的品行叫做“伪”，即经过“心”的思考，人们按照这种思考去做的能动行为，“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正名》）荀子主张性恶论，目的在于强调后天教育的必要性，强调人应当以主观的努力去改造自己的自然本性。他认为人的本性都是恶的，但经过“师法之化”、“礼义之道”，就能去恶向善，养成善良的品行。“涂之人可以为禹”，这是有进步意义的论断，“是他的学说的极有光辉的地方。”（郭沫若《荀子的批判》）荀子主张“化性起伪”，却并不

是要人们寡欲、去欲，而是强调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都得到均衡的发展，“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礼论》）我们可以说，性恶论既是荀子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荀子是我国战国时期的著名教育家，长期从事教育事业，直到晚年也未停止教学生涯，因此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教育理论和教学原则。

在教学内容上，荀子说：“学何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劝学》）。在他看来，儒家经典著作是教学的主要内容，培养为整个社会效力的圣人君子是教学的根本目的。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目标？荀子提出了“学莫便乎近其人”的观点，认为“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除了书本知识外，良师益友的言传身教也是不容忽视的，“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儒效》）。既有书本知识，又注重师法之化，这还不够，还要追求全粹之美的境界，“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要求人们对学问的爱好，就象眼睛爱看各种色彩，耳朵爱听各种美声，嘴巴爱吃各种美味一样，坚定不移，这就叫做“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